

辽宁省金融脆弱性研究

张振家

(沈阳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 沈阳 110041)

摘要:当前关于金融脆弱性的研究集中于国家这一宏观层面,对于省域金融脆弱性的研究还存在相当大的研究空间。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相对创新性的视角,在对金融脆弱性现有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对辽宁省的金融脆弱性的诱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推动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拓展规模较大的银行的非利息收益以提升银行盈利能力以及全力清除不良贷款是应对辽宁省金融脆弱性的可行策略。

关键词:金融脆弱性;流动性错配;银行盈利能力;不良贷款

中图分类号:F83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807(2018)11-0100-04

1 金融脆弱性研究综述

Kaufman 结合当时的研究成果指出关于一国金融脆弱性的研究大多关注过高的债务^[1]。随后的西方学者则普遍认为在宏观经济学中,金融脆弱性的含义应被界定为金融系统由于受到小的且有规律性的经济冲击而走向了大规模的金融危机^[2]。而国内学者曾诗鸿给出的定义则更为细致,认为金融脆弱性指的是金融业受到金融监管的疏漏、道德风险、经济周期波动、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的冲击,从而导致引发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等的一种性状^[3]。

那么又是哪些因素诱发了金融脆弱性?又该如何应对金融脆弱性?Diamond and Dybvind 提出的“Diamond-Dybvind 模型”在解释金融脆弱性产生的原因与对策方面具有重要地位,其结论也被学者们广泛采用。该模型具体阐述了流动性错配问题,即由于银行所接受的储户的活期存款(银行的负债)可以被允许在任何需要的时间进行支取,但银行发放的贷款(银行的资产)却很难在短期内以较高的价格售出,这就造成了流动性错配,其中银行的债务比资产的流动性更强,并且这种错配具有引发银行挤兑甚至是金融危机的风险^[4]。Diamond and Rajan 的合作研究也认为流动性错配会引发国内金融系统的脆弱性^[5]。为了降低这种金融脆弱性的程度,首先银行可以重新修订或润色与活期储户之间签订的存款协议,例如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暂停进行将存款兑换成现金业务;其

次,政府也可以颁布实施存款保险金制度以降低银行的挤兑风险,并保障银行资产与负债结构处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6]。

此外,Eichengreen and Hausmann 从道德风险假设、原罪假设以及承诺问题假设三个方面探讨了引发金融系统脆弱性的诱因和应对措施。道德风险假设源于两个方面,即国家会给国内投资者和金融机构提供援助以及国际社会将为陷入金融危机的国家提供支持,这使得国内外投资者获得了一种虚拟的安全感,并转化为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去进行投资的动力,而这种动力正是国内金融系统脆弱性的根源。原罪假设指的是金融系统的不完善性,这种不完善使得本国货币无法在国内外金融市场中进行交易,从而使国内市场的金融脆弱性不能避免,原因在于所有的国内投资者都存在着货币错配问题。此时解决问题的方法往往是采取美元化的货币政策。但美元化货币政策本身往往也成為了诱发国内金融系统脆弱性的主要原因。而承诺问题假设指的是交易双方(特别是债务方)的违约行为所引发的合同无法执行的情况,主要涉及法律与技术性问题^[7]。

金融深化本身即蕴含着金融脆弱性是学者们在研究金融脆弱性诱因问题上又一个广泛采用的研究视角。关于金融深化最著名的理论来自于1970年代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的研究成果,认为金融变量在发展中国家中往往受到抑制而难以发挥其作为

收稿日期:2018-08-28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L17BJL010)。

作者简介:张振家(1978—),男,辽宁沈阳人,沈阳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产业发展。

金融杠杆的功能,因此金融自由化是金融深化的必要手段,并且强调发展中国家应减少行政手段对金融自由化的干预^[8]。Demirguc-Kunt and Detragiache 却指出,虽然金融自由化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作用,但同样也会增加国家金融脆弱性风险,特别是在金融机构尚未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和金融抑制的转型国家。因此,终止金融系统自由化发展对于降低金融脆弱化风险是有效的,但还要取决于政府的判断,即金融脆弱性的成本是否超过了金融自由化所带来的收益,以及政府是否期望通过监管来降低金融市场失败的风险而并非加强这种风险^[9]。此外,Gennaioli et al. 结合此次发源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着重分析了金融自由化所引发金融过度创新与监管失位问题。为此,政府应首先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并且特别需要对金融中介对投资人资金保证的明示或者暗示的监管^[10]。

在对金融脆弱性的概念、诱因以及控制方法进行论述之后,另外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即该如何选取合适的指标去评价金融脆弱性。为了评价金融深化与金融脆弱性程度,Bonin and Wachtel 使用广义货币供应量(M2)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以及银行提供给私人部门的国内信用占 GDP 比例这两个指标来衡量^[11]。而世界银行的 Cihák et al. 则拓宽了评价指标范围,使用了包括银行资产占 GDP 比例、银行资本占总资产比例、银行监管资本占风险加权资产比例、银行不良贷款占贷款总额比例、银行部门 Z 统计值(使用银行资产回报率与所有者权益占银行资产比例等数据来计算,反映了银行的盈利能力,并且数值越大,银行破产的可能性越低)、债券市场规模、股票市场规模、活跃度以及股价指数波动均值等一系列指标来评价一国或地区的金融系统的深化程度以及脆弱性程度^[12]。IMF 的 Sahay et al. 在研究新兴市场国家金融深化问题的时候也沿用了 Cihák et al. 所使用的指标范围^[13]。

综上所述,虽然学者们基于具体问题的经验研究,使用了不同的方法去判定金融脆弱性产生的原因与程度,但研究内容总体上可以被归结为两个视角:第一、国内金融系统深化本身所蕴含的脆弱性。在进行脆弱性评价的过程中又具体使用了两个指标系列:即包括流动性错配、不良贷款所占比重、银行盈利能力等指标在内的银行部门金融脆弱性评价指标系列;以及包括股票价格指数波动等指标在内的金融市场脆弱性评价指标系列。第二、国内金融系统在开放经济中所面临的金融脆弱性风险,即货币替代风险,并

具体使用货币错配、资产替代等指标数据来进行评价。因为货币错配与资产替代是从货币职能角度进行研究,属于外币对本币在计价、价值储藏以及支付等货币职能上的替代,因此,美元化正是货币替代的重要表现形式。

最后,在应对金融脆弱性风险方面,通过缓解流动性错配来降低银行挤兑风险,降低不良贷款比例以及加强金融监管是降低国内金融系统脆弱性最为直接而有效的措施,学者们对此也都达成了共识。但在应对开放经济中由货币替代引发的金融脆弱性方面,学者们的态度产生了对立。部分学者认为采取美元化货币政策应当是提高本国金融市场应对外部冲击的有效措施,但美元化政策也将动摇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削弱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反而会提升本国金融脆弱性程度。

2 辽宁省金融脆弱性诱因分析

如果将研究视角从国家层面收窄至省域层面会发现关于金融脆弱性的研究将主要关注于金融深化本身所带来的金融脆弱性。由于没有货币发行权限,所以无法计量外币存款与 M2 的比例,并且省域银行和金融系统业务必然要在国家金融和货币政策的框架下才能展开,因此,依据现有研究方法去计算和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省域金融系统的货币替代问题将会非常困难。据此,本文的研究也将研究焦点放在了金融深化本身所带来的金融脆弱性上,并总结出以下诱发辽宁省金融脆弱性的几个主要原因。

2.1 流动性错配

虽然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已经废弃使用 75% 这一贷存比红线作为银行监管的主要风险指标,但贷存比作为参考性指标仍然存在,并继续发挥对银行部门脆弱性的监管作用^[14]。此外,由于辽宁省非银行金融机构存贷款规模占金融机构存贷款总规模的比重极小(例如,2016 年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为 7.45 亿人民币,不足金融机构贷款总量 38 685.6 亿人民币的 0.000 2),因此,金融部门贷存比可以比较精确地反映出银行部门的贷存比数据(数据来源同表 1)。

从表 1 的数据来看,2008 至 2014 年,辽宁银行业贷存比呈不断上升态势,并于 2014 年达到了 79% 的历史高位。虽然在随后的两年中贷存比有所下降,但仍未低于 75% 的红线。这组数据表明,银行流动性错配从 2008 年以后持续累积,银行部门通过合理的成本去获得资金从而偿还到期债务或从事其他正常运营的能力在逐渐削弱。

表 1 2008—2016 辽宁省金融部门贷存比

年份	年末存款余额	年末贷款余额	贷存比
2008	18 223.2	11 794.6	65%
2009	22 758.6	15 549.6	68%
2010	27 372.5	18 689.8	68%
2011	30 832.4	22 831.7	74%
2012	35 303.5	26 306.5	75%
2013	39 418.0	29 722.0	75%
2014	42 053.1	33 023.5	79%
2015	47 758.2	36 282.8	76%
2016	51 692.5	38 685.6	75%

注：存贷款年末余额单位为亿元人民币。
数据来源：2017 年辽宁统计年鉴以及作者依据年鉴数据所做的计算。

2.2 银行盈利能力降低

虽然目前还没有或无法获得针对辽宁省的银行部门的 Z 统计值数据,但从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发布的《辽宁省金融运行报告》中也能捕捉到一些直接的线索。从报告中的数据来看,2017 年辽宁省银行机构盈利水平总体下降。2017 年,辽宁省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实现利润 377.1 亿元,同比下降 27.5%。其中,虽然城商行表现较好,实现利润 234.3 亿元,同比增长 14.9%,但其他类型银行机构盈利水平则较上年下降^[15]。

2.3 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质量下滑

此外,虽然表 1 的数据表明辽宁银行部门所提供的信用规模在不断扩大,但贷款质量却不断下降,这主要表现在过去的三年中,辽宁银行部门不良贷款率仍然高企,且不断攀升。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 年辽宁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 1 016.52 亿元,比年初增加 31.91 亿元;不良贷款率 2.81%,比年初下降 0.18 个百分点。2016 年辽宁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 1 144.61 亿元,比年初增加 128.1 亿元;不良贷款率 2.96%,较年初上升 0.15 个百分点。2017 年辽宁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含大连)不良贷款余额 970.1 亿元,与年初相比增加 206 亿元,不良率为 3.31%,较年初上升 0.47 个百分点。

3 辽宁省金融脆弱性应对策略

3.1 推动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

银行部门占据金融业核心地位是我国(当然也包括辽宁省)金融业发展的普遍特征。但这也会带来金融发展的脆弱性,理由即在于私人部门所需要的信用如果过多由银行部门来提供,不仅不利于私人部门获得信用,同时也加剧了金融脆弱性向银行部门的过度集中,从而为整个地区的金融发展带来脆弱性。

金融业供给侧改革的关键议题之一就在于推动非银行部门金融机构的设立,并分担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信用压力。从当前的情况看,辽宁非银行部门金融机构的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2016 年,辽宁省新增金融机构 110 户,新增新三板企业 92 户^[16]。在一年之中,在如此宽泛的领域,如此密集地批设法人金融机构,这在辽宁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但作为经济和金融业发展相对落后地区,非银行机构,当然也包括非公有制银行所发挥的效用还远远不够,还需要与实体经济更为深入地融合,分担银行信用压力,从而最大限度地增强整个金融体系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能力。

3.2 拓展规模较大的银行的非利息收益,提升银行盈利能力

存贷款利息差仍然是辽宁商业银行收入主要来源,这构成了银行盈利渠道的单一,同时也会削弱银行系统盈利能力,并导致由此产生的银行系统性风险的累积。徐斌和郑垂勇进一步指出,利率市场化改革会对这种固有的商业银行净利息收入渠道带来压力。面对更加激烈的竞争,商业银行必须大力拓展中间业务,增加非利息收入,从而拓宽盈利渠道,实现经营收入的多元化^[17]。但朱波、杨文华和邓叶峰使用成分预期损失(CES)方法对 2008—2014 年期间我国 14 家上市银行系统性风险进行研究之后却提出,非利息收入与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关系是非线性的,中小规模银行非利息收入的提升不但不能降低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反而会增加银行系统经营的脆弱性。反之,较大规模银行增加非利息收益确实会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而针对中小银行而言,只有加强对其信息披露的监管,才能在其增加非利息收益的同时,削弱银行系统的脆弱性^[18]。

3.3 全力清除不良贷款

由于各个银行不良贷款来源不同,所以清除贷款的途径也有所差异,但这并不妨碍从银行的具体实践中提炼出一些共性的方法。具体的做法包括:第一、强化银行内部管理。应首先建立健全内部风险责任制,完善贷款审批流程,明确各部门责任与分工,增强对信贷风险的控制能力;其次,城市商业银行应提升内部稽核职级,增加稽查核实的管理范围和权限,将因风险所带来的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内^[19]。第二、分地区、分债务水平高低去优先清除相对小额的不良贷款。在此可以借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辽宁分行的成功经验。2009 年,辽宁分行集中爆发信贷风险案件,背上了 388 户企业、115 亿元的巨额不良贷款包袱。在清除不良贷款的总体思路上,辽宁分行将辽

阳、盘锦和鞍山 3 个“重灾区”作为主阵地,同时,对其余 6 个余额相对较小的二级分行的不良贷款首先进行集中清理,通过区域性清零,发挥破冰效应,历经 8 年的努力,最终于 2017 年 6 月收回最后一笔不良贷款^[20]。第三、提升党政部门协调银企(特别是银行与国有企业)债务债权关系的能力,并竭力为银行部门消除不良贷款提供帮助。

4 结论

研究表明金融脆弱性的诱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金融深化本身带来的金融系统脆弱性以及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货币替代。从在中国知网上的查询结果来看,关于省域金融脆弱性的研究是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的,并且几乎没有涉及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货币替代所引发的金融脆弱性。研究表明,诱发辽宁省金融脆弱性的原因同样主要来自于金融深化本身,并主要包括流动性错配、银行盈利能力下降以及不良贷款率高企等。基于这些因素,推动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拓展规模较大的银行的非利息收益以提升银行盈利能力以及全力清除不良贷款应是能够削弱辽宁金融脆弱性的有效应对策略。

参考文献

- [1] KAUFMAN, HENRY. Debt: the threat to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tability[J]. *Economic Review*, 1986, 71(9): 3—11.
- [2] LAGUNOFF ROGER, SCHREFT STACEY. A model of financial fragility[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2001, 99: 220—264.
- [3] 曾诗鸿. 金融脆弱性理论——银行不良贷款生成的监管机制与动态路径[M].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9(5): 1—2.
- [4] DIAMOND DOUGLAS W, DYBVG PHILIP H. Bank runs, deposit insurance, and liquidity[J].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Quarterly Review*, 2000, 24(1): 14—23.
- [5] DIAMOND DOUGLAS W, RAJAN RAGHURAM G. Liquidity risk, liquidity creation and financial fragility: a theory of banking[G]. NBER Working Paper, 1999, 7430.
- [6] DIAMOND, DOUGLAS W. Banks and liquidity creation: a

- simple exposition of the diamond-dybvig model[J]. *Economic Quarterly*, 2007, 93(2): 189—200.
- [7] EICHENGREEN BARRY, HAUSMANN RICARDO. Exchange rates and financial fragility[G]. NBER Working Paper, 1999, 7418.
- [8] 张振家. 东亚地区货币竞争与人民币国际化研究[M].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13: 67.
- [9] DEMIRGUC-KUNT ASLI, DETRAGIACHE ENRICA.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financial fragility[G].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1917, The World Bank, 1998.
- [10] GENNAIOLI NICOLA, ANDREI SHLEIFER, ROBERT W VISHNY. Neglected risks,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financial fragility[G]. NBER Working Paper, 2010, 16068.
- [11] BONIN J, WACHTEL P. Dealing with financial fragility in transition economies//Eds. in systemic financial crises: resolving large bank insolvencies[M].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141—157.
- [12] CIHÁK MARTIN, DEMIRGUC-KUNT ASLI, FEYEN ERIK, LEVINE ROSS. Benchmarking financial systems around the world[G].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12, WPS6175.
- [13] SAHAY RATNA, et al. Rethinking financial deepening: stability and growth in emerging markets[G].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No. SDN/15/08, 2015.
- [14] 张振家.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金融脆弱性的表现与控制[J]. *管理现代化*, 2017(3): 8—11.
- [15] 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 辽宁省金融运行报告(2018)[EB/OL]. <http://shenyang.pbc.gov.cn/shenyfh/2929347/3562881/index.html>.
- [16] 张学军. 金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推辽宁振兴发展[N]. *辽宁日报*, 2017—02—05(001).
- [17] 徐斌, 郑垂勇. 利率市场化下我国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影响因素分析——基于 16 家上市商业银行的实证研究[J]. *南京社会科学*, 2018(3): 31—37.
- [18] 朱波, 杨文华, 邓叶峰. 非利息收入降低了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吗? ——基于规模异质的视角[J]. *国际金融研究*, 2016(4): 62—73.
- [19] 郑义. 辽宁城市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研究——以辽宁 10 家城市商业银行为例[D]. 沈阳: 辽宁大学, 2013.
- [20] 实干铸精神 担当祛顽疾——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辽宁分行不良贷款“清零”纪实[J]. *紫光阁*, 2017(10): 64—65.

Research on Financial Fragility of Liaoning Province

ZHANG Zhen-jia

(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henya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41,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on financial fragility concentrates on the macro level of the state, and there is still considerable research space for the provincial financial fragility. According to such a relatively innovative perspectiv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s of financial fragility in Liaoning Province on the basis of a review of existing research on financial fragility, and proposes some main feasible strategies to deal with Liaoning's financial fragility, such as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on-bank financial institutions, expanding the non-interest earnings of large-scale bank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profitability of banks and taking every effort to eliminate bad loans.

Key words: financial fragility; liquidity mismatch; profitability of banks; bad loans